

柯偉林序

體育為什麼重要？為什麼波士頓的氣氛會伴隨紅襪隊球運的浮沉時而高漲、時而低落？NBA 球星姚明，以及洋基隊的棒球投手王建民，遠在大洋彼岸從事大相逕庭的體育運動，怎麼分別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台灣的民族英雄？為增進國際體育精神而創辦的奧林匹克運動會，怎麼成了表現民族自豪感的擂台？

這些問題並沒有簡單的答案。2008 年北京奧運會舉辦在即，梳理現代中國體育政治史恰逢其時。這也正是這本書的目的及貢獻。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中國現代國家以種種他國的模式為樣板建立及重建，而體育賽事的歷史發展，是與之相通的。

中國是一個偉大而古老文明的發源地。但是，作為政治實體、於 1912 年在清朝灰燼之上建立的「中國」，則要年輕得多。20 世紀中國統治者的偉大（很大程度上也是成功的）事業，正是在多民族、多文化的龐大王朝的領土之上，締造一個由漢人領導的民族國家。因而，以受尊重的民族國家的身份參與國際外交角逐的動力，與現代奧林匹克運動的興起，以及作為一種國際文化現象的觀賞性體育運動的發展，幾乎是嚴絲合縫地同步發生。

一個極大的迷思是，中國僅僅在最近30年才「對外開放」。這並非事實。與此相反，在過去一個世紀，中國參與國際交往是常態，孤立主義的年代（約1960–1972年）反是一大例外。一系列按照國際慣例制訂的憲法，讓中國成為一個共和國；從華爾街到莫斯科的廣泛的國際合作，令中國式資本主義及隨後的社會主義得以發展；以美式、歐式和蘇聯式的高等教育模式為圭臬，則成就了中國的高等教育；中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之所以能生存下來，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曾與德國、美國以及蘇聯有著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夥伴關係。

體育在這一新興國家的建立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初衷也許在於減少國與國之間的爭端，但同時也幫助建立和增強了新的國家認同。1904年的奧運會，恰逢美國在聖路易斯舉辦「購買路易斯安娜紀念博覽會」（即萬國博覽會），清廷藉展覽之機將大清王朝粉飾成中國文化的保護者（儘管並沒有派任何運動員參賽）。作為對比，1927年國民革命之後上台的國民黨，對新首都南京的早期規劃中，就包括建立一座奧林匹克運動會規模的體育場；並首次派出運動員，相繼於1932年和1936年參加奧運會。

正如徐國琦所展示的，在中國，政治和體育從一開始就緊密相關；南京政府之所以派出中國第一位（也是1932年唯一的一位）奧林匹克運動員，部分原因是擔心他可能代表日本傀儡偽滿洲國參賽。1936年，由69人組成的中國奧林匹克代表團，既標誌著中國自信心的增強，也幾乎可以肯定象徵了中國與東道主德國的親密關係。中共建政後，它參加奧林匹克運動的資格受制於政治因素——台灣的中華民國政權受國際奧林匹克賽事承認，而體育比賽的地位也受制於政治結盟。通過近年才公開的資料，徐國琦在本書中追溯了一段有關執行高層指令、操縱比賽和讓球的歷史，

足與1919年的黑襪事件相提並論，儘管唯一的賭注是下在外交舞台上。

在今天，體育純粹了很多，政治卻一如往昔。有關台灣問題的爭議在聯合國這樣的國際場合一直存在，並因台灣參與國際奧林匹克運動的特殊歷史而在奧林匹克的大背景下反覆爆發，這也是2008年北京奧運會面臨的更為緊迫的問題之一。因北京與台北之間的政治關係無法達成共識，這次的奧運會火炬傳遞將不經過台灣（台灣被迫以「中華台北」的名義從後門重返奧運會），「兩個中國」問題的爭論所導致的緊張由此可見一斑。

歷史學家、新聞記者，以及對體育賽事在現代中國之興起有興趣的人，都將從這本書中學到很多。下一代人也將同樣從中獲益。如徐國琦指出的，這本書首先是一本現代中國精英如何看待體育的歷史。然而，如在其他地方一樣，在中國，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大眾參與、大眾消費體育賽事的時代。中國對西方體育賽事的熱切參與是晚近才發生的事情，今時今日，於清王朝舊都之上建立的「新北京」正在迎接「新奧運」，現在正是回顧這段歷史的最佳時機。

柯偉林 (William C. Kirby)

哈佛大學歷史系蓋辛格講座教授

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主任

2008年